

院士叢書

時代的探索

張

灝
◎
著

院士叢書

時代的探索

張 灝◎著

院士叢書

時代的探索

2004年7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張 瀨
發行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中 央 研 究 院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責任編輯 沙 淑 芬

校對 鄭 天 凱

封面設計 胡 筱 薇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723-8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前言

現代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曾說過：「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在我年來的歷史論著中得到充分的印證。這些論著表面看來似乎龐雜無統序，但它們直接或間接都與我對時代的感受有密切的關係。

這份時代的感受最初浮現是1949年我離開中國大陸的前夕。其時我十二歲，心智尚很幼稚，當然無法理解當時時局巨變的意義。但山雨欲來的氣氛已開始浸入我的直覺，留下一些朦朧但強烈的印象。

那年春天，國共和談破裂，中共大軍直逼長江，南京城陷入一片混亂，學校也隨之停課。就在停課那天，無事可做，我和幾個朋友年少不知愁，隨著一位同學到他家去玩。他的父親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家就坐落在南京城北的高級住宅區，那兒都是一座座花園豪宅。使我吃驚的是，我們這一群大孩子居然能在他家及附近的深院大宅裡穿梭式地隨意來往奔跑，不但無人阻擋，而且也看不見一個人。當我向這位同學問起原因時，他淡淡地回答：「他們都跑了。」我這才猛然發覺，

幾天之內，南京已變成一座空城。一座空城？這是為什麼？一種莫名的困惑與恐懼開始浮上心頭。記憶中那是一個特別燦爛的江南春天。明媚的春光灑落在花木扶疏，綠草蔓生的庭園上，卻給我一種異樣荒寂而沉重的感覺，似乎預示著：周遭的繁華行將消逝。

不久我們也跑了，父母帶著我去了上海。在上海短短的兩個月，我借讀位於市郊的上海中學。因為學校距離市區相當遠，學生都是住校的寄宿生，只能在週末回家。記得每個週末我來往於市區與郊區之間，總看到軍車穿梭不停，田野間到處都是士兵忙著建築防禦工事，一片四郊多壘，戰禍臨頭的景象。學校有夜自修的制度。那些日子我每晚上罷初中部的夜自修，在回宿舍的途中，穿越校園，看到高中生已經自動停止晚自修，大伙兒一群群的圍坐在草地上，人影幢幢中，飄散著「團結就是力量」那首「進步」歌曲。歌聲低沉而激越，氣氛凝重而興奮，遠處依稀可辨的是田野間黑壓壓的碉堡，與不時傳來的哨兵口令聲。這些景象我完全不能理解，但本能地使我感覺一場大風暴就要來臨。

隨後我們去了台灣。那時的台灣正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之下，政治氣壓極低，在我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對我的時代感受與政治意識難免有些壓抑與扭曲的影響，但離開南京和上海前所留下的那些感覺與景象，卻仍然不時地出沒在我的腦際，在那裡發酵，在那裡潛滋暗長，像地下水一樣灌溉著我的時代感。由於它的驅使，我進了台大歷史系。也由於它的牽引，我在校園裡找到了殷海光先生，投入他的門下。大學畢業後我去

了美國，海外遼闊的學術天地與思想視野，終於使我長年累積的時代感凝聚成多年來求學的中心問題：如何探索這時代大風暴的思想根源與背景？

近十年來，這探索留下了一些蹤跡，就是這裡搜集的文章。它們都是直接或間接討論近現代思想與文化變遷的文字。特別是有關我所謂的「轉型時代」(1895-1925)的論述，這不是偶然，因為長久以來，我認為轉型時代是中國近現代大變動形成的一個關鍵時期。

我把這本文集定名為「時代的探索」。多承聯經的厚意與林載爵先生的督促，這本文集幾經我的拖延，終於問世，特別在此一併致謝。

目次

前言.....	i
世界人文傳統中的軸心時代.....	1
一、西方學界對「軸心時代」的看法.....	2
二、「軸心時代」的起因.....	5
三、「軸心時代」的思想特徵.....	10
四、「軸心時代」的影響.....	17
革命的教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年有感.....	27
不要忘掉二十世紀！.....	31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37
新的傳播媒介.....	37
思想內容的變化.....	44
結 論.....	60

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	61
一、近代西方民主觀念的兩個基本類型	62
二、中國知識分子與高調的民主觀	65
三、民主與全民主義	69
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	75
大民族主義vs.小民族主義——族群解紐的危機與困境	93
世紀末的危機意識	99
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	105
一、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	106
二、懷疑精神與「新宗教」	113
三、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	127
四、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132
扮演上帝：二十世紀中國激進思想中人的神化	141
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	161
一、轉型時代烏托邦主義的發展脈絡	162
二、烏托邦主義的類型	169
三、結 論	205

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思想道路	209
引子	209
歷史的回顧	210
激化與革命崇拜	211
激化與歷史的理想主義心態	213
激化與激進的理想主義	215
群體意識的激化	216
個人觀念的激化	221
激進理想主義與共產革命思潮	224
結語	228
幽暗意識的形成與反思	229
殷海光與中國知識分子——紀念海光師逝世三十週年 ...	237
一個劃時代的政治運動——再認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 ...	243
一、戊戌維新運動與中國政治秩序危機的序幕	244
二、戊戌維新運動與思想轉型時代的序幕	252

世界人文傳統中的軸心時代

如所周知，「軸心時代」(Axial Age, 800-200 B.C.)是德國思想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在19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觀念。他指出在那個時代，古代舊大陸的幾個主要文明地區，西從東地中海，東至中國的華北，南至印度的恆河流域，都曾同時產生了思想與文化的突破。在他原來的構想中，中亞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現也是包括在「軸心時代」的文化突破裡，不過近年來學界對祆教是否開始於那個時代，已有懷疑與爭議。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們仍然可以說，世界三個主要文明，西方中國與印度，在它們早期發展的過程中，都曾經歷過「軸心時代」的文化躍進。

這篇文章有兩個目的，首先是對歷來有關「軸心時代」的認識與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檢討，更重要的是：從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對這時代的歷史意義提出一些個人初步的看法。

一、西方學界對「軸心時代」的看法

西方學界第一次注意到「軸心時代」這個歷史現象是十九世紀初葉。當時，法國的東方學家亞貝爾-雷慕沙(J. P. Abel-Remusat)已注意到公元前1000年間，在古代東西幾個主要文明的區域裡，大約同時發生空前的思想躍進¹。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學者拉蘇斯(Lasaulx)在他的論著裡已經把這個現象提升到歷史哲學的層次去反思²。

但是一個半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這個文化歷史現象雖迭有討論，到今天，西方學術界的主流仍未給予這現象應有的重視，推究起來，大約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西方史學與社會科學界的主流，承襲了理性主義的傳統，一向是從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構去看世界歷史的發展，自然很難看到非西方地區(如中國與印度)的文化思想躍進有何舉足輕重的世界性影響，韋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學術傳承就是一個顯著例子。如所周知，韋伯對非西方世界幾個主要地區的文化發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較文化研究，但是因為他的思想架構是建築在西方文明特殊發展出來的理性觀念上，他雖然對中國與印度傳統文化都有專著，卻並未重視這些文化在「軸

1 J. P. Abel-Remusat, "Memoire sur la vie Les opinions de Lao-Tseu",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VII (Paris, 1824), 1-54

2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Zurich Artemis Verlag, 1949), 28

心時代」所產生之思想突破的影響。

韋伯學派在美國的主要傳人，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1950與19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觀念為出發點，把世界各種文化放在一個統一的演化架構內作比較研究。不錯，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紀以後世界幾個主要文明圈內所發生的「哲學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談到古代文化發展的創新，他只認為古代西方的希臘與以色列是他所謂世界文明演化的「苗床社會」(seedbed societies)，而中國與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³。韋伯與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是二次大戰後在西方盛行的現代化觀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說是現代西方學界的一條主流思想。這條主流思想在近年來，透過貝拉(Robert N. Bellah)對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論著，特別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較文化研究，開始正視「軸心時代」在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意義，但他們對「軸心時代」的認識是否對西方學術主流產生影響，尚在未定之天⁴。

這裡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學術主流之外，對「軸心時代」這觀念也有一些反響，其中最重要的當數西方現代思想家佛

3 Talcott Parsons,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6), 95-108 「哲學的突破」這觀念見Talcott Parsons,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y Max Web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4 Robert N Bellah, "Religions Evolution", in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32-33, Samuel N Eisenstadt,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Albany, N Y SUNY Press, 1986)

吉靈(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與歷史》(*Order and History*)⁵。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爾——韋伯這一思想傳承對「理性」這觀念所作的狹隘理解，因此他在評價世界文化的發展時，可以對「軸心時代」作相當同情的了解，但問題是他跳出了黑格爾——韋伯這一思想傳承的小框子，卻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畢竟還是以古希臘與希伯來的精神思想為本源，從這本源深處他吸收了一些對宇宙與生命的感受以及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認識。以此為根據，他縱覽世界文化的各主要發展，給予古印度與中國文化在「軸心時代」所出現的思想躍進很高的評價，但最後就生命與歷史的領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認為後者可以與古希臘與希伯來文化在同時所產生的思想突破相提並論。

上面說到在西方學界主流內外對「軸心時代」這一論旨所產生的一些反響，但這些反響卻經不起西方學界在近30年所湧現的一股強大思潮的衝擊，這股思潮就是一般所泛稱的後現代主義。這股思潮在兩方面對「軸心時代」的討論間接地產生負面影響。首先，後現代的一個基本觀念是否認主體意識對了解文化現象的重要性。而主體性的重要性正是「軸心時代」論旨的一個前提：這個時代的出現正由於當時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體意識產生了突破性變化，否認了這個前提自然使人無法看到「軸心時代」的歷史意義。其次，後現代思潮與「軸心時代」論旨都重視人類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認為不同文化之間有高低發展之異，而前者

5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60, *The Ecumenic Age*, vol 4 of *Order and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2-4

則因為有文化相對主義的傾向而否認不同文化之間發展程度的高低差異性。二者在這方面觀點的不同，自然使得「軸心時代」這觀念在後現代的思想圈裡沒有引起興趣。

上面的討論不但使我們了解為何「軸心時代」的論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學術界與知識界受到廣泛重視，同時也可反襯今天重提這論旨的學術與文化意義。一方面它可幫助我們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認識人類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認識「軸心時代」這個文化現象，我們也可避免文化相對主義的陷阱，進而看到人類一些共有的經驗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區裡形成內容迥異的思想躍進，而這些躍進為此後人類文明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開啓了一個新的紀元。

二、「軸心時代」的起因

探討「軸心時代」這個歷史文化現象，我們首先會問，為何這個現象發生在世界某些地區而不在其他地區出現？更重要的是：為何這個現象在古代幾個主要文明地區同時出現？原因是甚麼？這發生緣起的探討當然是重要而且饒富興味的問題。西方學者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認識這現象時，就曾提出這個問題。當時有些學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為答案。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個文化現象先在一個地區出現，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區⁶。鑒於「軸心時代」的文化躍進，在不同的

6 Eric, Voegelin, *The Ecumenic Age*, 3-4。

文明地區，以不同的文字形式與思想內容表現，這種文化散播的說法當然很難成立。

也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各文明的歷史環境變動所造成的刺激與回應去解釋「軸心時代」思想突破的出現。例如德國學者亞佛得·韋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間，印歐游牧民族從今日俄國南部向外移動，四處遷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開始與當時幾個主要文明地區接觸而產生衝擊。因此他認為這種人口大遷移所造成外在環境的刺激，足以解釋為何印歐民族遷徙所至之處，當地人民受到震盪，對生命產生新問題與新思想，由此而有「軸心時代」的思想創新⁷。

此外，歐洲學者魏爾(Eric Weil)也曾經從環境論的觀點提出類似的解釋。他指出「軸心時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文明發生崩解的過程中產生。這不是偶然，因為文明的崩解代表當時人對社會現狀感到不滿，而不滿自然產生改變現狀的希求，從而有突破的可能。因此他認為文明的崩解可以算作突破的一個必要條件⁸。

這種環境的解釋，失之過簡，不能看到問題的複雜性。就崩解導致突破這個解釋而言，首先在事實層次上，就很有欠缺。不錯，中國的軸心突破是出現於東周以封建宗法為基礎的文明

7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16, Alfred Weber, *Das Tragische und die Geschichte* (Hamburg Goverts, 1943)

8 Eric Weil, "What is a Breakthrough in History?", *Daedalus* 104, no. 2 (Spring 1975), 21-36

體系的崩潰過程中。就古印度的軸心突破而言，它是發生於公元前800-500的年代。其時印度的社會經濟結構是有些重要變化，但印度文明體系的整體並未進入分崩離析的狀態。至於公元前800-600年發生於古以色列的軸心突破，以色列是當時西亞文明的邊陲小國，隨時都受著外來侵略的威脅，內部分為南北兩個小王國，也不無政治的動盪，但大致而言，西亞文明體系的整體並未崩解。至於古希臘，至少到公元前800年就已明顯變成城邦林立的文明，當軸心突破開始發生於公元前500年前後，希臘的文明體系並未處於分崩離析的過程中。因此，所謂崩解→突破之說，就事實而言，只是一些模糊影響之談。同樣重要的是：即使有文明崩解的事實，正如亞佛得·韋伯所指出的，古代人口大遷移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爭與破壞，這些都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但歷史證明這些大規模的環境巨變在別的時候並不一定激發思想創新，例如公元四至五世紀，羅馬帝國崩潰之時，蠻族入侵，歐洲陷於分裂，並無思想突破、文化創新伴之而來，何以獨獨在「軸心時代」有此結果？環境論對此沒有回答。

持環境論的學者，有時針對「軸心時代」發生的社會經濟變化立論，去解釋當時的思想巨變。例如奢帕(Romila Thaper)在解釋印度「軸心時代」佛教的興起時，就曾特別強調公元前1000年以印度恆河流域發生了古印度史上所謂的「第二次城市化」現象(second urbanization)。這現象帶來了空前的經濟變化，如鐵的開始應用、馬的飼養、犁耕農業的出現以及市場經濟相應的發展，連帶新政治與社會組織的演化，這些所形成的歷史環境的劇

變，自然給人以世事無常的感覺。這就是佛教的基本觀念之所由起。因此，他認為就佛教的興起而論，印度「軸心時代」的思想文化突破是可以從當時的社會經濟變遷找到原因⁹。

這種環境的解釋也失之於太簡化，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印度的「軸心時代」，除了佛教的興起，尚有古婆羅門教的《奧義書》(*Upanishads*)的出現，而後者的思想與前者有著相當不同，何以同樣的社會經濟環境可以出現不同的思想？再者，中國的「軸心時代」是晚周，如所周知，晚周也出現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的巨變，與印度「軸心時代」出現的「第二次城市」現象很類似，而晚周出現的思想變化與當時印度的思想變化內容迥異。二者在這方面的迥異，配上社會經濟環境的相同發展，又將如何解釋？對這些問題，環境論都難以作答。可見就「軸心時代」思想變化的成因而言，環境論的解釋是有很大限制。

近年來德國學者羅茲(Hemer Roetz)研究儒家倫理與「軸心時代」的關係，應用西方心理學家科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的個人認知發展模式去解釋文化總體的發展，後者認為個人一生的認知發展大約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所謂的前習慣期(pre-conventional)：相當於人的童年期，對事物的反應完全以自我為中心，他的行為完全取決於這個行為是否會給他帶來一時的滿足與快感。第二階段是習慣期(conventional)：是指

9 Romila Thapar, "Ethics, Relig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 C in Northern India", *Daedalus* 104, no. 2 (Spring 1975) 119-130